

八年來美蘇「和解」關係之檢討

陳柏聲

多年來，尤其是第二次大戰後，美國與蘇聯的對外政策由於意識型態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一直呈現着分歧。分歧的程度，又因時間或空間的不同，就有了關係緊張或和緩的差別。美國歷屆政府在對俄採取圍堵政策的期間，也曾有謀求和緩關係的措施。如日內瓦、大衛營(Camp David)和玻璃鎮(Glassboro)等次的高峯會議，都是實例。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就任總統後，否定歷屆政府對共黨侵略的圍堵政策，而提出他的所謂「和解」政策。此種政策正符合季辛吉的思想。首先向蘇俄試探，一拍即合。從是年起至一九七四年福特接任總統，迄今為止，八年之中，美蘇「和解」關係的得失誰屬？成敗為何？及其對世局的影響，都是值得檢討的。

尼克森主義與「和解」政策

尼克森原是一位反共的鬥士，因為他了解共產主義的毒害和蘇聯的國際陰謀。當一九四八年他任眾議員時，即曾以愛國的熱情與堅苦卓絕的毅力，排除一切的困難，解決了希斯共謀案(The Hiss Case)。一九五九年他任副總統時，又曾在莫斯科與黑魯曉夫從事「廚房辯論」(Kitchen Debate)，而制服了強橫狂妄的對方。只看尼氏的「六次危機」(Six Crises)一書第一、五兩篇，就可大致了解他當時「反共思想的堅定」。

尼氏反共思想的動搖，初見於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號「國際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的「越戰以後之亞洲」(Asia After Vietnam)一文。他主張結束對北平的圍堵政策，而改取說服的積極政策。一九六九年他就職總統後，於是年七月發表「關島談話」，越年二月向國會提出「外交政策報告」。之後，他把這些文件的要點對全國廣播，而被稱為「尼克森主義」。其要旨是要結束多年來美國對國際共黨的圍堵政策，而以談判代替對抗，求達成關係之和解。可見所謂尼克森主義是以「和解」政策的實施為其標的。

什麼是「和解」？季辛吉說：「Detente」此一名詞的真意，是在對美蘇間一種較具有建設性關係的尋求，而此種關係即反映我已經概括說明的現實。」^①這是季氏主觀下的「真意」，並非根據辭典的定義。

「和解」原不甚符合英文 Detente 的字義，故有用譯音為「低盪」。英文此字來自法文 Détente，其意義為「解除」(release) 或放鬆 (loosen)，與俄文「razriadka」的意義大致相同。但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二八年倫敦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報曾先後用 detente 作為和緩國際緊張情勢的意義。一九六〇年蘇聯發行的字典對 razriadka 的解釋，也與英文 detente 之義相同。^②儘管美蘇雙方對 detente 的字義不生歧見，但在實際運用上却有分歧。這裏先檢討尼克森的「和解」政策。

尼氏的和解政策使用之對象，不僅是蘇聯，而且是中共。其目的在使莫斯科與北平互相牽制，華府得以從中取利。他的公開表示，却是強調為著維持世界的和平。但歷年來的事實，證明了尼氏這種構想並無實效，反而是北平抨擊美俄和解是兩個超強的勾結，為著侵略第三世界。

克里門斯 (Walter C. Clemes Jr.) 的近作「和解對中共與俄共的衝擊」(The Impact of Detente on Chinese & Soviet Communism) 論斷美國對蘇聯和中共分別進行和解，對世界安全最大的不利，就是使它們雙方都解除兩面作戰的恐懼，而可能鼓勵北平或莫斯科走向衝突之路，導致雙方大規模的戰爭。^③作者的這種揣測，正與尼克森的構想相反。究竟尼克森和解政策的得失如何？根據歷年有關的事實來檢討，較可獲致客觀的結論。對此，須先檢討蘇聯對和解的企圖。

蘇聯對和解的企圖

前年十一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有大維 (Richard Davy) 的一篇論蘇聯為何要和解的文章。其中指出：布里茲涅夫一面需要取得與西方的無限制貿易，更多的計算機和一系列的協定，使和解不會改變；另一方面，布氏警告，意識型態的鬥爭要加強，因為西方正在企圖顛覆社會主義。

該作者還引伸的說：對於和解，蘇俄實用主義的人們認為可就蘇聯現有的權力範圍，予以接受，並把資源轉用於國內的發展，那是一種合理的事情；在蘇俄的國家主義者或對外擴張主義者，則認為和解是換取時間與資源的一種方法，以建立蘇聯的權力，形成一種體制，使蘇聯對外影響力合法化，並迷惑西方，使其軟弱與不安全。^④

註① 「論和解及其展望」台北美國新聞處編，第四頁。

註②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 28, No. 2, 1974, pp. 133-4.

註③ Ibid., P. 154.

註④ Why the Soviet Union is Paying the Price of detente, The Times, Nov. 11, 1974.

關於蘇聯對「和解」的企圖這個問題，就筆者接觸到的這類資料，上述大維一文的論斷，大致較為符合事實。至於他認為蘇聯內部對和解政策有實用派與對外擴張派之分，那還是有待證實的問題。

在大維此文發表前一年，美國政論家艾索普（Joseph Alsop）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和解的詭計」（Deception of Detente）一文，指出蘇聯的和解政策具有兩種現實的企圖：一是要大量輸入西方的信用貸款和西方的技術；一是為發展蘇聯的強大軍力，備作對中共發動突擊，以摧毀其核武設置。但是，他又反過來寫道：「各大國的政府，包括蘇聯政府，沒有任何忍痛的選擇，像上面所說的（指突擊摧毀中共核武設置），會有一致的決定。所以美國已經確實表明，準備供應蘇聯所需的貸款和技術。這就是為著增強莫斯科內部反對採取軍事行動者的立場。」^⑤

艾氏所說蘇聯的第一種企圖，與上述大維文中推測布里茲涅夫的第一面構想，大致相同。也是一般論者的共同看法。艾氏所說蘇聯第二種企圖的箭頭是指向中共，大維則揣測那箭頭是指向西方。他倆預測的方向不同，但這兩位名作家都認為蘇聯內部對和解政策有兩派的歧見。

究竟蘇聯內部對此重大問題是否有左右派之分？去年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紐約市對美國總工會（AFL-CIO）發表的演說，有一段話與此問題有關，值得重視。特述其要點：有人說，克里姆林宮有左右派之分，雙方鬥爭，我們的行動應避免干預任何一派。這是狂想的話。某種爭權鬥爭是有的，但他們對基本問題有共同的想法，一切視黨的需要來決定。在那種制度下，凡與國家想法相反的思想，都受壓迫。

三年前賴雅士（Crosby S. Noyes）在「底特律新聞報」發表一篇論證蘇聯危害和解的文章。他指出，蘇聯領導階層意識型態的妄想狂，是和解受危害的主因。他並引述包倫（Charles E. Bohlen）的近著中一段話——「史達林死後二十年來，蘇聯的政治哲學仍然毫無改變。今日莫斯科的意識型態之重要性，正如在一九三四年。」以佐證他的這項論斷。^⑥

尼、布互訪帶來的「和解」態勢

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訪俄。這次莫斯科高峯會談的主要結果，雙方簽訂了限制反飛彈系統條約和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臨時協定。此外還達成了關於環境保護、公共健康與醫藥、外太空探索以及科技合作等協議，於會談期間和爾後分別簽訂協定。

一九七三年原為布里茲涅夫訪美的約定期。由於美國水門事件發生，國際間不少預料布魯訪美可能展期，以靜觀華府政潮的變化。其實不然，布魯樂得利用那種情況，使用雪中送炭的手法，去發掘和利用尼克森的弱點，期獲得談判的優厚果實。所以他於訪

註⑤ Deception of detente, Washington Post, Oct. 3, 1973.

註⑥ Detroit News, Sep. 27, 1973.

美前一個月在西德訪問時，曾趾高氣揚地宣稱：「越戰已終了，蘇聯與美國的關係是在繼續順利發展中。」^⑦一九七三年六月布魯訪美期間，雙方把過去談判達成的各種協定草案，舉行隆重的簽署儀式，同時在兩國的首都公布，以表示「和解」的成功。此種舉措當然各有其對內宣傳的作用。

這次高峯會議還達成了多種協定和兩項議定書，分別關於農業合作、海洋研究合作、運輸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天然氣和石油的經技合作、文教接觸、交換和合作、兩國人民免除雙重納稅、原子能和平用途、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和防止核子戰爭等協定，以及設置通商事務所議定書和擴大航空運輸議定書。

會談結束時——六月廿四日雙方發表的冗長「聯合公報」，不僅詳述此項會議的成就，並且提及上次會談的功效。全文看來，很富有宣傳的意味。尤其是頌揚越南協定結束戰爭，恢復和平；重申兩國對歐洲和平的願望；聲明共同努力，促成中東和平迅速實現。對年來兩國商務發展和經濟合作，表示滿意。幾個聯合委員會——原子能和平用途、農業研究發展、世界海洋研究和運輸合作等將設置；科技、文教的接觸、交換、合作，都要擴大。^⑧由此可見這次尼布會談帶來的「和解」宣傳態勢。

在上述兩次會談——尤其是第二次會談中，美、蘇官方為宣傳而表露的態勢，加以當時蘇俄的報刊和廣播的吹噓，使國際間的言論界認為那是美、蘇和解關係的「蜜月期」。美國的言論界有喝采的，也有作理智批評的。例如，華盛頓郵報的社論，認為伸延文化交流協定，是美國的「嚴重錯誤」，因為「在實際上，蘇聯是否定人文基本價值的。」^⑨紐約時報的社論則論斷有關開發西伯利亞天然氣和石油的經技合作協定，對美國並無實益，而且是不智之舉。^⑩

貿易協定的廢棄與和解基礎之動搖

季辛吉曾說：「一九七二年美蘇貿易協定是兩國和解的基礎。」^⑪那末，兩年後這項協定的廢棄，不能不認為是該基礎的動搖。尼克森第一次訪俄期間，為交換蘇聯承諾續付所欠第二次大戰時的借債和租地債，曾表示可取銷美國對俄貿易的差別待遇，而給予最惠國待遇。克宮的首領們指望與美國密切合作，俾取得數十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以供大規模採購美國的工業技術和成品，協助其工業現代化，遂與之進行談判。之後，美國國會裏醞釀反對，影響到此項談判的進行。

註⑦ Bonn, May 22, 1972, CNA-UPI.

註⑧ Text of Summit Communiqué, San Clemente, June 25, 1973, AP.

註⑨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1973.

註⑩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73.

註⑪ Express News, Taipei, June 15, 1973.

越年（一九七三年）美、蘇貿易激增至十億九千萬美元，較尼氏訪俄前一年增加五倍以上。這種事實更促進莫斯科對美要求最惠國待遇。布魯曾對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發表談話，其中提到：他不了解爲什麼有些人硬要蘇美關係的整個前途，與蘇聯任何個人不獲移出的問題連在一起。

回顧一九七二年美蘇開始談判貿易協定時，莫斯科是抱著尼克森原來的承諾。但是美國參議員賈克遜（Henry Jackson）在參議院提議：政府對此談判，須說服對方停止或減低猶太移民的出境稅。

爾後在貿易協定送達國會審議期間，衆議員范尼克（Charles Vanik）等會同賈氏等提出修正案。該案的要旨，是要求蘇聯在獲得對美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同時，須放寬對其國內猶太人移居出境的限制。他們並建議，此項修正案作爲國會審議中之貿易改革法案的一部分，適用於一九七二年美蘇貿易協定。

莫斯科認爲美國國會這種行動，實際上是要蘇聯准許其公民自由移出，作爲給予貿易平等待遇的交換條件。這是干涉蘇聯的內政，是在誘惑蘇聯的少數民族背離他們的國家。

當時沙茲柏格（C. L. Sulzberger）以「布里茲涅夫爲的是什麼」爲題，發表一文。指出：「布氏不僅憤恨美國作此干涉蘇聯國內事務的不當要求，而且他認爲他如果爲取得對外貿易的利益，而作內政上之屈服，則他與其領袖階層中強硬反對派的關係，就會處於困難的境地。」^②沙氏似在無意中做了布魯的義務說客。

當時「消息報」和「真理報」攻擊美國國會的詞句，火氣很盛：那項法案「是出諸勒索的策略」；「是受極右派、軍事工業集團、猶太民族主義游說團的聯合壓力所控制」；「這班人都是在破壞蘇美合作，都是和解的敵人」。

美國國會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過賈克遜等的貿易法案修正案，要政府取得蘇聯承諾：放棄對猶太人移出的限制；准許每年最少有六萬猶太人移出。美國則給予最惠國的貿易待遇。同時賈氏聲明：莫斯科必須信守這種協定，否則美蘇全部關係的信用將受摧毀。他並透露：國務院已同意設置一個機構，以偵聽蘇俄對此協定的執行。他也自作承諾：他所主持的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將尋求擴大職權，以從事此項工作。^③

賈克遜的這些舉措，使得克宮原有的一些與美妥協的意念頓形消失。加以美國國會對於進出口銀行在四年內給予蘇聯最高額三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不予通過，更使得他們作取消美蘇貿易協定的決定。克宮授權塔斯社作此宣告，並聲明：美國要以蘇聯公民的移出，作爲最惠國貿易待遇的交換條件，是違反一九七二年的貿易協定。對於此項干預蘇聯國內事務的企圖，應予澈底反對。

季辛吉也發表聲明：蘇聯廢除一九七二年的貿易協定，並取消一項它對猶太人移居出境人數的諒解。美國政府對此轉變，感覺

註② What's in it for Brezhnev?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1, 1974.
註③ Washington, Dec. 13, 1974. CNA-UPI.

遺憾。因爲一向認爲與蘇聯的互利貿易，是全面改善關係的重要因素。由於這些發展，福特總統決定該協定不能付諸實施，並且不應給蘇聯以最惠國的關稅地位。美國沒有理由認爲蘇聯將加重其他方面的緊張局勢。「如果這事件導致一種加緊壓力的時候，則美國將以極大的決心及全民聯合一致，加以對抗。」同時，福特授權白宮發言人聲明：總統深信克宮此舉不致破壞美俄和解的基本政策。¹⁴

美俄間經兩年餘對貿易與貸款問題的談判，其結果是貿易協定的廢棄與貸款事件的擱淺。美國言論界對「和解」的觀感，有認爲雙方利益懸殊的「和解」是危險的。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早已有此先見之明。¹⁵也有認爲美蘇和解是一種「緊迫的外交僞善」(Impacted Diplomatic Hypocrisy)，如見於前鋒論壇報上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 Jr.)的專論¹⁶。較爲溫和的評論，則認爲美蘇和解已遭受挫折。連季辛吉也曾如此說過。總之，無論那種觀感或說法，貿易協定的破裂，正是美蘇和解基礎的動搖。

從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看「和解」

早在一九七〇年，美蘇已在進行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談判。到了一九七二年雙方簽訂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臨時協定」，是以五年爲期。在此期間的談判，被稱爲第二階段談判。它的開始正式談判是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在日內瓦舉行。經一度停頓後，於次年二月恢復談判。雙方提出的條約草案內容，顯示距離很遠。在日內瓦經兩月的談判，毫無進展而休會。

一九七四年三月，季辛吉起程赴莫斯科時宣告：此行爲尋求「觀念的突破」(Conceptual break through)，寄望於本年內產生一項限制戰略攻擊武器條約。但他在莫斯科經三天的談判，因雙方相互排斥對方提出的草案，而無結果。

據美國「新聞周刊」報導：季辛吉行前曾將美國的草案祕密對蘇聯駐美大使多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有所透露，該大使對季氏表示相信此次談判可能成功。¹⁷季氏抵俄後，布魯德諾伊正在伊拉克訪問的蘇聯國防部長葛瑞契柯(Andrei Grechko)回國出席政治局會議。由於葛氏堅決反對美國的草案，布魯德諾伊堅持他們自己的草案。

此次談判的失敗，西方的言論界有認爲布魯德諾伊正在注視尼克森受彈劾問題的發展，不想於此際與華府達成協議。而且他是要利用美國內部的糾紛，企圖取得限核談判的有利地位。¹⁸亦有認爲美方過於輕信此次談判能够成功，也是導致失敗的原因。¹⁹同時，蘇

¹⁴ Washington, Dec. 15, 1974, AP.

¹⁵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74.

¹⁶ The Coils of Detente, Herald Tribune, Feb. 2, 1975.

¹⁷ News week, Apr. 8, 1974, P. 13.

¹⁸ Herald Tribune, Apr. 3, 1974; Ed., Washington Post, Apr. 10, 1974; The Times, Mar. 30, 1974.

¹⁹ Editorial, the Guardian, Mar. 29, 1974.

俄的「真理報」則指稱此次談判失敗的部分原因，是美國軍事工業對華府施用顯著的影響力。

原來一九七二年簽訂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臨時協定，對雙方飛彈的限定，并未指明其類型和性質，而只作數量的籠統限制——美國為一七一〇枚，蘇俄為二二二八枚。此兩種數字也即發射器的數量。美國的數量較蘇聯為少，發射的威力也不及蘇聯的強。當時美國的讓步，是否有政治的原因，不得而知，不過官方公開的解釋是：當時美國已領先有了多彈頭飛彈（MIRV），而蘇聯尚未試驗成功。

但是，到了一九七三年六月布魯訪美時，美國的偵察衛星已發覺蘇聯在從事多彈頭飛彈的操作，足以證明它試驗SSX 17和18兩種多彈頭飛彈都已成功。SSX 17的威力與美國的義勇兵三號多彈頭飛彈相等，且每枚較義勇兵三號能多帶一個彈頭。SSX 18的威力較大，且每枚較義勇兵三號能多帶三個彈頭。因之，此次的美蘇高峯會談，對這項談判，仍無進展。只同意「限定」於次年（一九七四年）年底前，日內瓦的談判須達成最後協議。上面提過一九七四年三月季辛吉起程赴俄談判時發表一些樂觀的談話，似是誤信上述高峯會議的那項「限定」。

季辛吉此次訪俄任務失敗之後，華府有改變與俄談判的意圖。據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透露：「季辛吉於四月十二日表示：現在美國大概已放棄希望在本年底前與蘇聯達成一項周全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條約，而將尋求一種小具熱望的協定以代之。——假定是一種聯合限制多彈頭飛彈，并協議將現有的五年臨時協定予以延長。」^{②③}

由於華盛頓郵報透露的這項消息，使得人們疑慮到是年六月尼克森第二次訪俄之行，是否對限核談判的新方向把握得穩。當時雷斯頓（James Reston）的一篇文章就是針對此點而發揮的意見。作者還引述曾參加第一回合談判的史密斯大使（Gerard Smith）的話，指出此次尼氏赴俄談判可能更多危險。^{②④}

果然，此次美蘇對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談判的方向是改變了。在尼氏赴莫斯科前，布魯已先宣佈：蘇聯準備與美國談判達成一種從限制到終止地下核爆的協定。^{②⑤}跟著，季辛吉在華府對記者們宣告：此次美蘇高峯會談，不像是為完成限制核武器協議，而是為產生一種局部禁止地下試爆的協定。^{②⑥}

美蘇這次高峯會議擱置有關限制戰略攻擊武器條約的談判，而以談判局部禁止地下試爆為主題。這種變化的主因，在美國是尼氏受水門事件的困擾，信譽與權力都已消失，已至對內對外無能進行該條約的談判。在蘇聯正樂得利用美國內部的弱點，爭取時間

註②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Apr. 26, 1974.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1, 1974.

註④ Moscow, June 14, 1974, CNA-AP.

註⑤ Washington, June 24, 1974, CNA-AP.

的拖延，以利其多彈頭飛彈和逆火轟炸機的發展，俾於將來的談判中，制服美國。

福特於一九七四年八月接任總統，初冬與布魯在海參崴會談，對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談判達成一項初步協定(Tentative Accord)。其要點是規定雙方的戰略武器發射器各為兩千四百個；多彈頭飛彈各為一千三百枚，均以十年為期。

季辛吉曾對記者們說明該協定的優點——最高額的設定，使將來的減少更容易談判；此協定不給美蘇任何一方有對對方發動強烈突擊的能力。^{②4}然而美國一般輿論並不如此樂觀。例如，華盛頓郵報的社論雖承認武器數量有限制較無限制為好，因可排除公開的競賽。但指出蘇聯多彈頭飛彈的發射威力較大與彈頭較多，可使美國人憂慮他們首先對美國陸上飛彈基地的襲擊。基督科學箴言報的社論則指責該協定是允許戰略武器質的改進之繼續競賽，而非限制其發展。^{②5}

次年(一九七五年)一月間，季辛吉在電視訪問時提到：「海參崴的核武協定，對防止核武器競賽已採取重要步驟。這是第一次雙方同意核武器最高額的存在，以減少乃至消滅危險，或者任何實質的減少危險。使得從事競賽的任何一方，會恐懼對方要做什麼。」^{②6}這是他對一般輿論批評的反應。

今(一九七六)年元月號的「國際事務」季刊有位曾參加日內瓦限核談判的核武器專家尼茲(Paul H. Nitze)以「和解時代確保戰略的穩定」(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ime of Detente)為題的一篇文章，對海參崴協定可能帶來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談判問題，尤其是美蘇的戰略武器平衡問題，有相當深入之檢討。全文重點之一是認定蘇聯的政策在求優越，而非平衡。他指出：就過去限核談判達成的各項協定，可以預見蘇聯將繼續追求核武器的優越地位，不只在數量方面，而且企圖發生一種理想的戰爭制勝能力。假如那種情勢發生，就有一種重大的危機——蘇聯會調整它的政策與行動，而不顧現在的和解情況。其結果可能重現對抗的危險，或者是它使用其他壓迫手段，去增進其勢力的擴張。^{②7}

越南、中東、安哥拉對「和解」的考驗

先看越南與「和解」

一九六九年美國開始對俄和解政策的近程目標，在求越戰早獲了結。尼克森誤信借重蘇俄對北越的影響力，可能促成和平協定的簽訂。莫斯科認清越戰已破壞美國的國內秩序和國際聲譽，使這種情勢延續下去，它會得到「和解」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商務

^{②4} Washington, Dec. 18, 1974, CNA-AP.

^{②5} SALT Questions Rema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4, 1974.

^{②6} Kissinger Sees detente as only Possible Policy, News Backgrounder, U. S. I. S., Jan. 27, 1975.

^{②7} Poul H. Nitze, Foreign Affairs, Jan., 1976, P. 207.

和限核談判方面能獲致的利益。

謀求蘇聯協助結束越戰，也是尼克森第一次訪俄的一項目的。克宮假「和解」的美名，虛與委蛇，一面取得美國對商務和限核談判的若干讓步，一面對北越增進支援。迨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巴黎協定簽訂，美國朝野不少誤認那是「和解」政策的良果。可是簽訂的墨藩甫乾，北越又復南侵。莫斯科和北平的軍火繼續大量供應。這種事實證明了季辛吉玩弄的「和解」，已受欺騙。

西貢淪陷前，阮文紹總統的一項宣告，也可證明季氏之被騙。阮氏說：「兩年前，簽訂巴黎協定時，季辛吉對我說，蘇俄和中共要減少對北越的軍火供給，並要鼓勵河內遵守停火協定。」²⁸

越南被攻吃緊時，華府要求莫斯科責成北越遵守協定，而得到的反應，却是誣指越戰的上升，乃是由於越南破壞巴黎協定。²⁹甚至對當時福特總統要求國會追加軍援越南和高棉的撥款，也被指為「違反巴黎協定」。³⁰

金邊和西貢淪陷前，柯錫金和葛羅米柯曾電北越總理范文同及外長阮文貞，保證蘇聯繼續給予北越各方面的援助。³¹淪陷之初，布里茲涅夫、柯錫金、波德郭爾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聯合電賀「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和「臨時革命政府」贏得「光輝的勝利」。繼著，莫斯科向越共要求將金蘭灣海軍基地，提供蘇聯使用。³²

當時國際間對於蘇俄假「和解」之名，行助長北越侵略之實，給季辛吉許多諷刺。只舉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一篇專論為例：它指摘美國和解放政策所達成的巴黎協定，導致了越南之被犧牲。季辛吉是這種外交的西方特出人物。³³

季氏對各方指責的反應，可見於五月十二日他在聖路易（St. Louis, Missouri）發表的演說。其中警告蘇俄「如果把和解當作客套語，則美俄關係的新趨向，將是危險的。」³⁴在此期間，福特曾聲明：「和解政策是我們要與兩個潛在的敵對者從事共同合作，而不是要他們來混水摸魚。」

次看中東與「和解」

美國對俄的和解政策，經不起考驗的危險性，其於中東較越南更為嚴重。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華盛頓郵報報導：蘇聯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埃戰爭時，曾誇耀它曾動員七個師，預備開赴埃及。儘管莫斯科加以否認，但是當時尼克森宣告美國準備進入緊急狀態

註²⁸ Saigon, Jan. 30, 1975, UPI.

註²⁹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五年一月廿八日。

註³⁰ MosCov., May 1, 1975, TASS.

註³¹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五年一月卅日。

註³²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75.

註³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27, 1975.

註³⁴ Kissinger's Speeches, Trying to Eliminate Policy Vacuum, Herald Tribune, May, 15, 1975.

，并聲言那是一九六二年美蘇間古巴飛彈危機後之另一危機。^⑤尼氏那種舉措，當非故弄玄虛。也許因之起了嚇阻作用。那種瀕臨核戰邊緣的情勢，在越南是不會發生的。

美蘇和解在中東經不起考驗的事實，如見於雙方在「逐步解決」與「恢復日內瓦會議」上之矛盾，以及對埃及、對敘利亞的爭取，都很明顯。

當蘇聯與埃及和敘利亞維持密切關係的時候，它認為中東問題由日內瓦會議來處理，會取得多數的支持，使美國處於劣勢。同時它會利用「巴游組織」參加會議的要求，使中東問題增加其複雜性，以扼殺美國求致和平的意圖。所以它極力反對季辛吉進行逐步解決的穿梭外交。

一九七四年，俄埃關係表現失調，近因是埃及感覺蘇俄阻撓它使用新武器，且在重要關頭，停止武器供應。在此期間，美俄雙方對埃及的爭取更加劇烈。埃及初尚採取騎牆態勢，以便左右逢源。這可見於是年五月一日沙達特總統發表的演說，一面表明埃俄間過去雖有歧見，但埃及不至於與蘇俄結束友好關係。另一面，他指稱：美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利益已由過去的忽視，轉變為積極的努力，為求一種真正的和平解決。^⑥

當時蘇俄為繼續加強其與敘利亞的關係，以破壞美國對戈蘭高地的隔軍方案，特邀敘利亞總統阿塞德(Hafez Assad)訪俄。布魯於歡迎宴會時說：敘、以間任何有關戈蘭高地的隔軍協定，必須是中東全部協定的一部分。任何局部協定絕不能取代全般解決。阿氏此次訪俄的重要收穫，是與布魯簽訂一項協定——蘇俄將貸予敘國巨大金額的軍經援助協定。^⑦當時「真理報」再度強調，中東問題的解決，必須經由日內瓦會議。

之後，由於開羅發覺蘇俄在埃及軍人中煽動反沙達特運動，促成了埃及疏俄親美的傾向。沙達特公開與莫斯科失和之後，敘俄關係曾一度更加密切。

一九七四年五月卅一日以、敘戈蘭高地隔軍協定的簽訂，是季辛吉穿梭外交的成功。當時阿塞德對莫斯科支援的作用已起懷疑。儘管是年四月間布魯還警告他不可接受透過季辛吉的敘以隔軍談判，但他權衡利害，樂得接受美國的斡旋。此種情勢使莫斯科不得不接受季辛吉此一逐步解決的既成事實。六月一日的「真理報」竟聲稱：此項協定的完成，蘇聯也分享有應得的信譽。

尼克森乘季辛吉促成以敘隔軍協定對美國有利的聲勢，往訪埃及、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約旦和以色列，此行的結果相當成功。不但取得了以色列對美國的中東政策進一步的諒解，而且加強了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在此種情況下——季氏的穿梭外交

註⑤ Washington, May 2, 1974, CNA-AP.

註⑥ Helwan, Egypt, May 1, 1974, CNA-AP.

註⑦ Herald Tribune, Apr. 27, 1974.

在半年內分別達成了以、埃和以、敘的停火、隔軍協定，美國的逐步解決策略已告部分成功。

最近——本（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美聯社聯合國電訊：埃及已要求祕書長於明年三月一日前，就重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採取具體步驟。它并呼籲以色列結束其「阻撓策略和拖延法術」。以大使宣稱：「就我們來說，日內瓦會議明天就可重開。我們要問：這種無結果的冗長爭論，究竟有什麼意義？」

同月七日美聯社電訊：以色列已正式要求聯合國大會早日恢復有關中東的日內瓦會議。九日法新社電訊：聯合國大會於當天通過兩項議案。一是允許「巴解」參加日內瓦的中東和平會議；一是要求在明年三月前召開該項會議。對此兩案，美國和以色列都投反對票。

這兩次投票的結果，贊成與反對都很懸殊。³⁸那顯然是美國的慘敗。將來日內瓦會議如果重開，美蘇的鬥爭，將是名存實亡的「和解」面臨另一考驗。福特因受安哥拉事件的刺激，曾聲明不再用「和解」這名詞了。

再次看安哥拉與「和解」

安哥拉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脫離葡萄牙而獨立。彼時取得控制權的三個集團：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U.N.I.T.A.）中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是親俄的集團，早已接受莫斯科的大批軍事顧問和大量軍火供應。受蘇俄裝備的古巴軍隊在安哥拉幫該解放運動作戰的已逾萬人。該解放運動與其他兩個集團作戰，節節勝利。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日，福特警告莫斯科對該解放運動的大規模軍援，將阻礙東西的和解。³⁹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福特再度宣告：如果蘇聯繼續對安哥拉的干預，將難免傷害美蘇間更廣大的關係。⁴⁰

由於美國參眾兩院先後通過議案，停止美國對安哥拉內戰派系的任何援助，福特的警告呼聲，莫斯科既不理會，而且加緊一意孤行，增強該解放運動攻城略地的戰力。這種事實又是美蘇「和解」關係的一大諷刺。

一九七六年六月美國在聯合國理事會否決安哥拉入會。莫斯科朝野反應的沉痛，好像是被美國咬了一口。這也好像是蘇俄對美國單程和解的一種回報罷！

綜觀八年來的美蘇「和解」關係，顯見在美國是單程的和解；在蘇聯，則誠如福特會慨乎言之的「混水摸魚」式和解。無怪福特已宣告廢止使用「和解」這個名詞了。最近美國總統當選人卡特內定范錫（Cyrus R. Vance）為國務卿。就范氏最近發表的外交政策談話以觀，今後美國的對俄政策，或許不會再走單程「和解」的絕路罷。

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完稿

註³⁸ 參閱本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一版。

註³⁹ Washington, Dec. 20, 1975, Reuter.

註⁴⁰ Washington, Jan. 5, 1976, CNA-AP.